第一部分　批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亨廷顿的世界

人类总是被深深的恐惧所困扰，因为生命如此脆弱，易受伤害并且时刻受到威胁。富裕的生活、社会保险、文化保护以及自我身份，凡此种种，皆因此而起。人类需要拥有自己的身份证明，他们希望并且需要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又将何去何从。确认身份表示划分界限，具有某一个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不会成为另一个人。在变革、危机和苦难的时代，这两种基本的现象汇合到了一起：随着恐惧感的增强，界限也变得愈加重要。寻找一个敌人，或是寻找一个替罪羊成为了某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则目标明确地针对那些所谓的“外人”。敌对势力是可怕的威胁，但是它们背后隐藏着一种同样可怕的东西，即对敌人的渴望，尤其当世道不好的时候。

《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缺陷中应运而生的。随着最大的敌对势力共产主义苏联的崩溃，西方政治社会的安全感较之以前有所增加，甚至感到安全了许多。他们不再受到战争的威胁，不会有核对抗直接在他们家门口发生，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常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安全。相反，很多事情却陷入了一片混乱，这并不是东西方对峙结束的直接后果，但它无疑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随着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和与此紧密相连的贸易、金融以及交流的不断融合和加速，也包括日益增长的

移民潮，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再是以前的模样，我们的未来难以逆料，我们再不能把一切罪责都归咎于可恶的苏联人了。

亨廷顿文明论的主要观点

亨廷顿向我们预示了事态发展的方向：根据民族的划分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推动，现在，世界历史各种文化正走向对峙，他所说的“文明”，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古代英语）中更喜欢用“文化”这个词来表达。各种文化将形成巨大的敌对集团，事实上这种对立现在也已经形成了。在地平线上，伊斯兰和儒教的联盟将直接威胁到西方社会的安全。在这里，“黄色威胁”（指西征至多瑙河流域的蒙古铁骑——译者注）和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远征军”被富有创造性地结合到了一起，而这两种势力在西方各民族共同的记忆中，都曾留下过根深蒂固的创伤。

《文明的冲突》为我们重新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实际上是在极端雄心勃勃地追求一种对世界的重新规划：它试图使我们相信，文明间的对抗正是现在和未来世界格局的“最本质状态”；文化传统才是促使人们采取共同行动、形成共同思想的源头。亨廷顿对人类文明进行了重新界定和划分，他试图通过对文化的决定因素，包括历史渊源、价值体系、生活方式、世界观和相应的社会、政治思维方式等等的深刻剖析，绘制出一幅世界新地图；同时，以文化为尺度，设计并构想未来的世界格局。有趣的是，亨氏文化划分的基点竟是宗教信仰。鉴于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教会世俗化趋势，这可能会令人感到吃惊。但是亨廷顿先生却将这种现代社会的“无神论”趋势搁置一边，而把宗教基础看做是更为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发展趋势，这显然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在这个基础上他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几大板块：

——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西方基督教文化；

——斯拉夫－希腊各国的东正教文化；

——涵盖中非、中东、中亚一直到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文化；

——非洲文化——尽管它纷乱芜杂，没有统一的表现形式；

—— 印度的印度教文化；

——日本文化；

——中国以及其东亚、东南亚周边地区的儒教文化。

另外，拉丁美洲文化是自成体系，基本上还是属于基督教——西方文化的范畴，亨廷顿对它没有做出明确的结论。

亨氏认为，西方文化由于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并且凭借国家和军事的优势，长期以来一直在全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他各国正在奋起直追，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迅速超越这些西方国家。亚洲会赶超欧洲，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占据统治地位时，西方文化与其他各国文化发生过剧烈碰撞，并且积怨已久。现在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遭到质疑和批判，随着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其他文化的方向转移，西方文化受到的排斥将会不断加大。

随着人口统计学的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准确、快捷地洞悉世界人口的增长趋势。统计资料表明，反西方文化的势力正显著增强。具体表现在非西方地区人口的迅猛增长上。世界其他各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都远胜于西方国家。非洲和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已达到或超过 3%，在这些国家，25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大多数。经济的停滞不前使这些生活无着的年轻人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丧失信念、充满失意和怨恨，不停地寻找可以发泄郁闷的对象。而宣扬反西方文化的自我认同观念，正好可以帮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们在生活中重新找回自我。年轻一代较之年长的父辈更具抗争性和暴力倾向。80 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苏，这些偏激的年轻人找到了反对正统基督教文化的理想场所，因此很可能存在一股巨大的反对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动员势力。

文化的类别一般都围绕着某个核心国家进行划分：美国及其西欧盟国自然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教文化圈；不管承认与否，日本的文化有其特殊性，尽管它与中国文化有许多渊源；俄罗斯是东正教文化的核心国家；印度文化圈和其国家范围是重合的；而非洲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则缺乏中心国家。亨廷顿或许偶尔提及土耳其有可能起到对穆斯林世界的领导作用，因此假如有一天安卡拉最终决定拒绝那些雄心勃勃的欧洲伙伴，北约则应该宽宏大量地原谅这个昔日的盟友。

在亨廷顿看来，各种不同的文化都体现了所谓的“霸权意识”，尽管它们又有所区别，但都会无一例外地影响其文化范畴内的人们的行为。于是，文明间的相互碰撞在所难免，冲突自然不断。现在，各种文明的交界之处正是相互摩擦、争端频繁的地区。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如波西尼亚、苏丹、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都呈现出内在的裂痕，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激烈的暴力冲突，甚至内战的爆发，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流血边境”，那里的问题更为突出。正因为此，分裂是能够促进和平的惟一选择：结束多元文化，创造纯文化的国家；停止跨越文化界限或国界的传教布道，尽管这种行为在宗教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在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许多方面，都曾取得了重大成就，譬如人权保障、政教分离以及妇女解放等等。当一种政治处于文化的结合部时，只有减轻内部各种文化间的碰撞和摩擦，才有可能阻止由此而引发的全球性冲突。

如其不然，亨廷顿认为我们将看到儒教和伊斯兰教形成的反西方同盟，这绝对是一个可怕的梦魇：文化间的战争，由于强烈的敌意以及冲突的多样化和突发性，很可能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使用，从而最终将演变成全球性的核战争：那将会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景象，人类会因此丧失一切理想和希望，变得毫无前途可言。

出人意料的是，在得出这种悲观的结论之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为文化间的合作与交流进行了辩护，这和前面章节中表达的主题迥然不同。难道这是为了引导读者自由想像而采取的策略性写作手法？抑或是实事求是的理智终于战胜了教条、僵化的思维模式？不管怎么说，迪特尔·森哈斯的评论是相当中肯的，他就事论事地指出，《文明的冲突》写的是关于“一个和解的计划，假如我们一味地按着它的思路不假思索地进行分析，那我们其实不必把这个计划太当真。”①

世界格局与世界现实

今天的世界格局，是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世界新格局。它无疑是一种国际新秩序。我们曾经对它津津乐道，希望它会给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带来久违的和平。如同在冷战时代，我们对所谓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划分一样，今天我们对世界的划分同样也过于简单和草率。“文明”的差异固然给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但它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利益驱动，所以很难避免产生较大的偏差。因此，我们很有可能像从前一样，

① Dieter Senghaas，“《文明的冲突》中的固执观念”，摘自《Blaetter fue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97年第2期215－221页。

为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况且，这种以文化为标准，重新规划出的世界格局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世界中的大量事实；同时，亨氏想要重建秩序的现实世界则更是不可预测和难以驾驭的。换一句话说：亨廷顿的理论包含了很多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观点肯定会使人不断产生疑虑，一种思想体系如果和现实严重脱节，它必将遭到激烈的批判，它对我们的意义也要受到怀疑。这种时髦的理论足以将理论家和实践者直接或者间接地引入歧途，需谨慎处之。世界历史上有足够的事例可以对此加以佐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曾风靡一时，但我们现在终于放弃了对它的追求。

我在此列举一些亨氏书中明显的错误命题，以及根据这些经过歪曲的事实所得出的高论，在这里，由于理论的需要，新世界格局的创造者们成为了牺牲品：

事例之一：亨廷顿提到“伊斯兰教的流血边境”，他试图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个论题。他指出，在最近发生的 31 起不同文化间双边或者多边的暴力冲突中，有 21 起，即有 2/3 冲突是在穆斯林的参与下发生的。①照此看来，似乎穆斯林是特别好战的种族。但是我们只要变换一下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发现：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在“文化间的冲突”中，总是会有非伊斯兰教的对手。根据这个思路，我们就可以用以下的方式重新解读这些数据：在卷入文化暴力争端的 62 个国家或派别中，只有 21 个国家，大约 1/3 是伊斯兰教国家或派别。这听起来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眼地图册，并且仔细观察不同文化间的界限，我们马上会得出结论，伊斯兰国家远比世界任何一个地区所拥有的外部边界要多得多。究其原因，是因为伊斯兰国家和民族

① 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21 世纪国际政治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Munich / Wien 1996，第 420 页

就像三明治里涂抹的奶酪一样，夹在其他的文化之间，而其他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大部分都被汪洋大海所屏障，例如“拉丁”文化只有惟一一处交界：墨西哥和美国。换言之，亨廷顿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早就知道的东西：互相接壤的国家，最有可能发展双方的贸易。假如经过彻底全面的思考（这也是人们对一个学者所期待的），我们不难看出，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好战性“远胜于他人”以及他们“流血的边界”，其实都是因为事先怀有某种偏见，错误选取资料，得出的不正确结论。那些数据不过是平均统计的期望值。

事例之二：为了论证伊斯兰—儒教联盟可能带来的可怕前景，亨廷顿严正指责了中国和北朝鲜向伊斯兰教国家出售武器的行为，尤其向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售。他还提到了中国和伊朗在核技术上的合作①。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向伊斯兰教国家出售武器的事实却避而不谈，后者出售的武器数量远胜于中国和北朝鲜的十倍之多，难道这表示会形成一个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同盟吗？如今，伊朗在民用核技术方面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俄罗斯，双方在完成两个动力核反应堆后，将再建两个新反应堆，并且在核技术的研究领域签定了多项合作条约，难道这意味着东正教—伊斯兰教联盟的形成吗？当今，在核技术方面合作最广泛的当属阿根廷和伊斯兰世界了。阿根廷在阿尔及利亚完成了一个供研究之用的核反应堆，在埃及也建立了一个核反应堆，并且和叙利亚也签署了类似的合作协议。阿根廷的核燃料运往阿尔及利亚和伊朗，如此一来，我们是否会受到“拉丁－伊斯兰教联盟”的威胁呢？

事例之三：在波黑冲突中，按照亨廷顿的说法，西方国家偏

①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第 387 页

祖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而俄罗斯、希腊这些东正教国家则对塞尔维亚人提供了援助；伊斯兰教国家则一致支持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但这只是事实的某些表象，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在冲突发生的初始阶段，德国（新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和同样属于新教国家的丹麦支持克罗地亚，而天主教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圣公会教的英国则和塞族站在同一战线。而随着战争的进一步激化，人类的同情心使事态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转而开始支持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他们终于决定使用武力介入这场冲突，向冲突地区冒险派遣了五万名士兵，去保护这个多元文化地区的非塞族居民，当然包括穆斯林自治区。俄罗斯的政策则只局限于保护塞族利益的最核心部分，而不愿意介入过多，它从一开始就同意继续对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实施经济制裁，也根本没有阻止北约对南斯拉夫采取的惩罚行动。假如这场战争是根据“文明间战争”的模式来进行的，那么西方和东正教联盟势力不仅应该赞许米罗舍维奇和图奇曼的设想，即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来主宰并划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同时它们也应该积极地促进这个计划的实现。果真如此，这对亨廷顿的论点将是一个有力的支持。顺便提一下，亨廷顿显然是“忘了”提及，希腊向塞族靠拢主要原因是为了对付反马其顿（同为东正教）联盟。因为正如雅典所担心的，某些势力对这个同名的希腊省份也同样虎视眈眈。这样看来，所谓的“文化战争”其实并未切中要害，最糟糕的是亨廷顿的理论在对战争的最后评价中所表现出的偏见：“在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东正教的塞族人进行了一场血淋淋的、灾难性的战争，并对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实施了血腥的暴力行动。”①这里完全颠倒

①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第 416 页

了黑白，混淆了刽子手和受害者的关系。但是由于亨廷顿是从“血腥的伊斯兰”开始谈及战争的，历史的真相便被抛到了一边。

所以，我们奉劝大家：当心那些夸夸其谈的“伟大理论”，谁若戴上有色眼镜，看到的只能是有色的世界，久而久之他会把世界当成是有色的了，而忘记了它的本来状况。如果我们在晴朗的时候仰望天空，并不会导致对现实世界判断的失真。但假如我们还是把眼光朝向地面，就会不由自主地根据感觉和印象，对东西的颜色做出错误的判断。亨廷顿关于“文化间冲突”的理论也是如此：但理论的眼镜改变不了无可辩驳的现实本色。①

世界观和方向性需求——《文明的冲突》畅销的原因

我所举的上述三个例子在《文明的冲突》中并不是个别现象，但是毫无疑问，亨廷顿的这部巨著即有关“文明的冲突”的观点，在国际关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赢得了许多赞誉。美国外交界精英们的舆论喉舌——享有声誉的《外事》杂志报道说，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文献引发过如此巨大的舆论波澜，尽管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在德国，《文明的冲突》也同样引起了巨大轰动，该书非常畅销，作者塞缪尔·亨廷顿成为各种讨论会和争论节目竞相邀请的对象，甚至德国的联邦议院，也邀请他担任对外文化政治的顾问。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冲突”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我们政治和报章语言中的常见特定词汇，这种状况着实令人担忧。语言对我们思想的深刻影响力，与我们的思想对语言的决

① Dieter Senghaas，“《文明的冲突》中的固执观念”，摘自《Blaetter fue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97 年第 2期 215－221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定作用一样重要。我们使用某些概念的频率越高，就越可能突然之间成为它的信徒；一个概念的传播越广，它使人盲从的危险系数就越大。而《文明的冲突》宣扬的概念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它包含了一个世界观。

危险信号其实早已出现，我在上述事例中已经明确指出：隐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理论，具有严重而且是不可救药的先天缺憾。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思想和行为，无疑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审视。这个结论来自各方对《文明的冲突》一书及相关论文做出的不同反应，尤其是那些来自学术界和专业人士的评论。正如我们提到的，反响完全不是异口同声的赞同，事实恰恰相反，文化专家和地区研究专家向作者指出了无数的质疑之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向这些理论和概念发起了挑战。面对这些振振有词的批评，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对作者的论点表示赞同、欢迎抑或是有所需要的势力到底从何而来？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回顾一下导言中提及的一些注释。同样，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世界的各个角落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没有一个地方不会受到冲击，即使是发达的工业国家也不例外。人类历史上也一直不乏类似的阶段，芭芭拉·图赫曼在她的历史研究著作中，提到的“ 14 世纪的谬误 ”便是一例。在那个时代，封建关系开始解体，资本经济替代了实体经济结构，一场触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风起云涌。世界末日情绪、宗派主义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①无独有偶，到了 16 世纪，世界贸易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首先在天文学上取得了突破，“ 地心说 ”遭到质疑，人类对宇宙有了更深的认识。欧洲的

① Barbara Tuchman，《远方的明镜 ~ 戏剧性的 14 世纪》，Munich 1982

宗教改革撼动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而到了离我们的时代相对接近的 19 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西方社会。在宗教改革和反对宗教改革的斗争中，西方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基督教分化派生出两种信仰；而在工业革命中则出现了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

如今，世界在“全球化”的口号下正经历着一场伟大变革。[①]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系列同时发生的变化过程，其中首屈一指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全面胜利。尽管它曾遭遇过诸多障碍。那些不久前在共产党国家还占据优势地位的计划经济，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盛行的保护和干涉经济体制，如今早已荡然无存，灰飞烟灭了。在这些国家，经济的传统形式——包括大型国企——即使还没有被排挤出局，也将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数以亿计的大众承担生活开支的方式，有了急剧的变化；同时，国际资本的流量和流速也呈激增态势。经济环境的变化速度也因此而比以前大大加快，情况变化之快，我们可以从 1997 年之前经济繁荣发展的亚洲国家那里获知。职位的稳定性，也就是我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现在几乎已经很少能得到保障了。便利的全球交通体系、通过互联网的全球化交流以及更大空间内的移民潮，使原本陌生、处于不同价值体系的人们可以更经常和更紧密地接触。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各自为政的日常实践都受到了挑战。

有些观察家在更广阔的空间——特别是在单一民族国家的社会中——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新观点，他们提到了“第二种现代

① Lothar Brock/Mathias Albert，“国家世界边界的消失——国际社会发展趋势分析”摘自“Zeitschrift fue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2. Jg，1995 年 12 月，第 2 期，259－286 页

化”的概念，它和第一种有本质的区别。① 其他一些学者，包括我在内，则认为在全球化的实现上，需要由自然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联合促成一个新时代的觉醒。② 但这两种观点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这种变革背后的社会政治后果将是巨大无比的。

正确洞悉和把握这种变革的不确定性和巨大挑战并非易事，假如自我认同感发生动摇、物质生活基础出现问题，独立自主地完成自己的毕生理想就越显艰难。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寻找新的方向，使自己有章可循，在这个千变万化、充满危险的世界能够找到出路。于是世界地图、价值标准以及行动指南便很受大家的欢迎。亨廷顿的书几乎完美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需求，他建议的世界观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编织模式，但却隐匿于深奥莫测的巨大背景中。他对历史、文化和哲学的大量描述、对世界各地无数事件细节的大量引用，使这个编排起来的模式变得非常有说服力而且具有权威性，对外行来说尤其如此。而书中无数的缺陷，例如我们前面列举的一些事例，或者被人忽视，或者被人排除；因为文稿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既真实可信，又严肃认真。这一点正是《文明的冲突》的精华所在，也是它的危险之处。

① Ulrich Beck，《何为全球化？——全球主义的误区》，Frankfurt a. M. 1997

② Immanual Wallerstein，《One World，Many Worlds》，New York 1988

③ DieterSenghaas，“在全球化和地区主义之间：为世界秩序辩论而书”，“Blaetter fue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93 年第 1 期，10－59 页

我们需要一种简单的国际政治理论吗？

奥克汉姆的剃须刀与理论的本来面目？

《文化的冲突》是用美国式科学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进行分析的产物。在美国，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中都追随一个取材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假设模式：理论的建立基于少数基本设想，它的内容应该简洁精确，以便能在现实中得到检验。但这些检验只能够暂时证明或者反驳这个理论，所有证明都是暂时的，因为不能排除将来某一个试验的结果可能会推翻这个理论。所以对科学家们提出的要求非常苛刻，他们必须竭尽全力“装点”自己的假设。因为只有不为诸多试验所推翻的理论才会被业界和公众认可，首先由卡尔·鲍伯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批评唯理论”，是从自然科学的经验演化而来的。①

就此看来，一种完美的理论应该建立在少量、简洁的基本设想之上，同时尽可能做到详尽的阐释。在审视各种不同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钟情于那些运用少量的假设就能涵盖同样内容的理论，简而言之：理论应该“言简意赅”。在科学史上，理论的简约性成为一种美德而得以广泛传播，这种科学精神以著名的后经院哲学家、现代科学的先驱——威廉·冯·奥克汉姆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奥克汉姆的剃须刀”。乌姆伯托·艾考（和肖·康纳利）在《玫瑰的名字》一书中，以其精湛的诠释永远纪念了这位大师。

不幸的是，现在许多美国的科学家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简约

① Karl Popper，《研究的逻辑》，Tuebingen 1969

这种美德的含义，他们将“婴儿和水”一同从自己的理论中泼了出去。在他们的理论中，不仅剔除了所有多余的东西，也同时丢弃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现实的理解认识，恰恰是必不可少的。世界政治的复杂性正在不断增长，然而这些情况在他们的理论和模式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和体现，而是缩减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对世界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变量和因素都脱离了我们的视野。

这种现象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实主义理论始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受人青睐的“宠儿”，它也正是《文化的冲突》这部书所宣扬理论的先导和原型。现实主义是以国际系统的无政府状态为前提，来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下面我们用现实主义模式来分析一下单一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竞赛。由于在这场竞赛中没有“裁判”，所以卷入其中的国家只能实施自救自保，以使自己能够在这种恶劣狭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积聚并增加保障权力的工具，其中军事力量的加强是最至关重要的。它们有时也和那些遭受同样威胁的国家结成联盟；或是加强彼此间合作，例如发展贸易关系以及相关领域的协作，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强自己权力的资源。事实上，这样的合作不但是极少的，而且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冒险因素：因合作而产生的利益很可能在分配上存在差异。由于这些利益直接关系到权力的资源，每一次不对等的分配对吃亏的一方都是极其危险的：受益方很可能成为潜在的对手，经济上的有利条件将会为下一次交战奠定军事上的优势。同盟关系也只有在共同的威胁一直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持，今天的同盟者明天有可能成为危险的敌人。

“现实主义者”会用这个简单的模式来诠释整个国际关系，所有国家，不论它们是民主体制、独裁体制，还是极权体制；也

不论是福利和平国家，还是“严厉”的尚武国家，都遵循着同样的行动模式。影响国际体制的重要因素，即国家统治制度的对立性，都被简单归结为权力资源在各国间分配状况的差异。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根据以下模式：随着权力资源分配的改变，现存的平衡将被打破，有些国家因此而变得强大，而另一些国家则受到削弱；于是便会形成试图重建平衡机制的联盟。假如别无选择，这种“均势”的失衡便会导致战争。①

这个理论忽视许多其他因素，诸如国内政策、地区差异、国际组织——所有这些都被“奥克汉姆的剃须刀”无情地剔除了。②这里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与那些持批评态度和理性主义的科学学者的一个重大的不同，后者在生活行为准则和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中都得到了普遍印证：美国国际关系界的权威理论家们——从新现实主义者到塞缪尔·亨廷顿，虽然都竭尽全力挥舞着这把“剃须刀”，他们对持批评态度的理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即对经验进行考核的高要求还是远远没有当真。他们构造自我假设的努力似乎是中性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在尽力遵循律师的“游戏规则”：只收集对自己当事人有利的证据，至于棘手的不利证据，则总是视而不见。

所以在探讨理论的发展这个问题上，由托马斯·库恩阐释的历史进步论败给了科学革命论。③库恩认为，如果不能确定是否违背公理的经验判断明显地增长，科学世界观——包含各种范例——就会陷入某种危机。如果科学家们最初忽视了这种危险信号，那么他们就会努力使新的结论符合已经形成的判断。于是他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79

② Vgl. Robert O. Keohane (Hrsg.),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86

③ Thomas S. Kuhn, 《科学革命的结构》, Frankfurt a. M. 197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